

中国历史引言

——中国历史上的波澜和曲折

吕振羽

历史课很重要，要把这门课尽可能地学好。过去有、现在还有一些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不放到哲学里，好像哲学只讲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谁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是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他们在哲学上谈得更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要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学好，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是不行的，一定要把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细致，了解得正确、具体，才能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中国的历史很悠久，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个大的波澜和几个大的曲折。这种波澜和曲折，每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恩格斯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① 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里面，波澜和曲折特别突出。所以，要突出地讲一下。飞跃和迂回曲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是个一般性的规律，我国历史的波澜和曲折特别突出。中国社会这样一个特点，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所谓的停滞性）相关联的。

^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2页。



下面讲三个问题：

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几个较大的飞跃和高涨——也就是生产前进中的几个比较突出的大波澜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生产上的飞跃（或者叫跃进）

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以后必然出现一个生产上的跃进，每一个社会都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斯大林讲过。至于中国历史上在什么时候进行了封建主义革命，大家的意见还不一致。郭沫若同志认为是在春秋、战国的交替期间。我今天仍是按照我的老看法来讲，这并不是说人家的不对，我的对，我只是按照自己几十年来没有改变的见解、也许是“顽固”见解来讲。



商纣王像

中国封建社会的革命是以“武王革命”作为标志。但是，中国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是有一个过渡时期的，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的不平衡性，这个过渡的时期就更长了。斯大林说，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大概经过了二百年，或者是不会多于二百年；同时他说，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大概是一百年，也不会超过一百年^①。我看我们是运用和掌握他的精神，就是说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历史的变革有过渡性，要经过一定的过渡时期，不一定在他的“一百年”、“二百年”这个数目字里面绕圈子。尤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民族这么多，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过渡期就更长了，所以我说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是从西周“武王革命”到春秋才完成。但是，各个地区不同：中央地区，由“武王革命”大概到“宣王中兴”就完成了；其他地方，有的晚一些，有的更晚。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1—122页。



在民主改革到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我们国家各兄弟民族的情况好像是一个历史博物馆（前天李立三同志到我这里来，我说我们是一个历史博物馆，他说是这么一回事，他到云南去看就是这样），有原始公社制的各类形态，有奴隶制形态，有封建制的前期农奴制，有后期封建制等形态。如果你只按照解放前或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前的彝族大小凉山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就可能得出奴隶制社会的结论；按照藏族及其他某些民族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便会得出农奴制社会的结论；按照鄂伦春、鄂温克等兄弟民族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便会得出原始公社制的结论。所以，要全面地看，要是只看一点，就会搞得一塌糊涂，什么时候都达不到一致。

“武王革命”以后，就是说封建主义革命以后，有一个生产上的跃进。这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在中国，照我的看法，封建主义革命以后的跃进，由于国家大、民族多，过渡性、不平衡性这样大，等等特点，跃进的情况不一样。从全国范围来看，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时间比较长。“武王革命”以后，在西周的过渡是跃进的，历史上有所谓“成康之治”。西周以后，齐、鲁跃进了；这些地方跃进以后，秦、楚跃进了；最后，在今天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的吴、越跃进了。所以表现为有的地方已经在衰落，有的地方还在跃进这样一个交错的形势。关于生产跃进、生产发展，今天不详细讲了，有一些情况同志们可以看书。

前汉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发展上第二次高涨或大波澜

关于生产波澜的情况，同志们可以看一下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平准书》，班固的《汉书·食货志》等，能够说明这时社会生产有一个高涨（为了和革命以后的跃进区别开来，或者就叫波澜）。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生产发展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波澜？原因在哪里？有一些什么条件？

我认为，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社会与战国比较，显著地出现了部分质变，就是说，由初期封建制到后期封建制这样一个部分质变。初期封建制是农奴制，后期封建制是佃耕制。同时，在政治上前期是分散性的，各个封建领主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半国家”；后期封建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汉以后，



这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代替了分散的封建割据的局面。由农奴制到佃耕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与之相适应，由分散到统一，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所以我们说秦始皇有必须肯定的一面，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面。

同时，在秦汉之交，出现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给封建制相当大的打击，封建统治阶级吓了一跳。所以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就不能不适应农民一些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一系列的改良政策，这也促使了生产向前发展。由于农民战争，迫使前汉朝廷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连续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都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黄帝像

再一条，当时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殷周一直到战国散居了许多民族（当时所谓部族、部落），在河南中原地区居住了不少其他民族，但到秦汉的时候出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他们大都成为汉族了，大家都融合了，或者是同化了。在这以前，这些民族之间互相有矛盾，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这些矛盾基本消灭了。在这以前，齐桓公之所以称霸，其中有一条是因为他“尊王攘夷”。他保护诸夏，而保护诸夏就是保护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他“攘夷”，到秦汉，不少“夷”都融化在汉族之中了。这种民族的融合或同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第四条，在汉朝的时候，北方的匈奴（即今天的内蒙古和蒙古国地区）是当时与汉为敌的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常打到内地来，也打到东北和西北去，从辽宁起一直到了新疆，一来就烧、杀、抢、掠，把人捉去做奴隶，如在新疆，甚至实行了奴隶制的残酷统治和民族压迫。后来汉朝把它打跑了（除到欧洲去的以外，残部就被吸收在汉族、蒙族等民族中来了，维族中也可能有）。匈奴原来叫“匈”，“奴”是后加的，是骂人的，不过现在习惯了也无所谓。汉朝一开始就和它作斗争，汉高祖到了大同（白登）曾被匈奴包围起来；西汉初年一直对匈奴采取防御性的政策和措施；直到汉武帝以后，才阻止了它，使它不能对内地、东北、



新疆的经济文化进行摧残与破坏；同时使得中原地区 and 新疆、东北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了；并开辟了从中国到中亚细亚、欧洲的丝绸之路。这对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保护和促进作用。

汉朝，特别是前汉的生产发展出现了高涨或波澜，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由于有了这样的发展，前汉的经济、文化便达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地位。

前唐（也叫“盛唐”）出现了我们国家封建社会时代生产发展上的又一次高涨或大波澜

所谓“盛唐”，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或在文化方面，都说明是很繁荣的，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不仰慕唐朝的文化。同时正因为唐朝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那样高，力量那么大，从国内各民族说，唐廷所依据的汉族地区的发展，又远远高于其他民族，它不怕其他民族的反对，因此李世民就能够在对待民族关系上提出一个“一视同仁”的政策。李世民基本上没有实行什么凶恶的民族压迫政策。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原地区的力量特别大，文化特别高，国内所有的民族都要求加强和它联系。松赞干布就是这样的，认为唐朝这么繁盛和强大，不能用战争从唐朝那里得到好处，只能彼此友好，才能取得唐朝的帮助。所以，他向李世民要求通好，并提出通婚，说：你给我一个姑娘作老婆，我愿意充当大唐的藩臣。在世界各国，唐朝的文化和力量也是很突出的，如那时日本由于很仰慕唐朝的文化，不断派学生到唐朝来留学，从唐朝学习东西。其他四邻的民族和国家，也有不少是这样。

这一次经济高涨的原因何在？有一些什么条件？

首先，也还是隋末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推动。毛主席说，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隋末，农民起义的规模很大，小说里面说是“四十八路烟尘，百零八路霾烟”，普遍到全国各个地区，它比起秦末农民起义来是规模更大，对封建制度的打击也是更加沉重的。



唐太宗《昭陵六骏》坐骑拓片



第二条，在隋末那样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了全国的统一。原来从十六国、南北朝起，全国长期是分裂的，里面包括民族战争。这时南北朝时那些相互进行战争的民族大都同化了，融化成了一体。南北朝时期有所谓张三、李四之说，就是说大多是同姓不同宗，而且原是不同的民族啊！（比如我们姓吕的原来说是姜太公的后裔，但是西凉的吕光也是姓吕，那么我们到底是姜太公的后裔还是吕光的后裔呢？我不知道。）刘、李、张、王四大姓，实际上是刘、李、张、王四杂姓。这时南北民族矛盾不存在了，南北生产方式达到了一致，所以隋朝能够统一，唐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发展了、巩固了。今天我们国家的疆土除去西南、西北某些边沿地区以外（西藏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结婚就自认为唐朝的藩臣，但它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大抵都是从唐朝就确定下来的。到唐朝，在中原地区，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都不断同化了、融合了；同时又发展、扩大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往。

更重要的一条是：由于隋末农民战争，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唐朝的所谓“均田”制，实际是利用大量无主耕地、荒地和公有土地，给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分一定的“口分田”和“永业田”。“口分田”是要按人口分的（实际上唐朝分了一次以后再也没分）。“永业田”就永远为田主所有。由于南北朝以来的长期战争和人口的死亡，许多田地因失去主人而荒芜。这些自耕农的出现，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唐朝实行了其他不少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李渊、李世民、唐高宗、武则天一直到后来的唐明皇（玄宗）都不断地做了一些工作。

这些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很多有利条件。这时生产力本身有明显的发展，所以唐朝生产发展出现了这样的一段高涨或波澜，即所谓贞观到开元的“盛世”。

两宋和辽、金的情况

两宋和辽、金是一个矛盾的情况。两宋社会的生产是发展的，出现了一个生产发展的高涨或波澜的局面。但是当时和北宋对立的辽（在今天的内蒙古、东北及山西、河北绝大部分地区）、金表现了如下不同情况：契丹原住地区的生产较过去有了空前飞跃的发展，但辽统治下的汉族地区却转为衰落，所以辽统治下的地区的情况是复杂的。辽统治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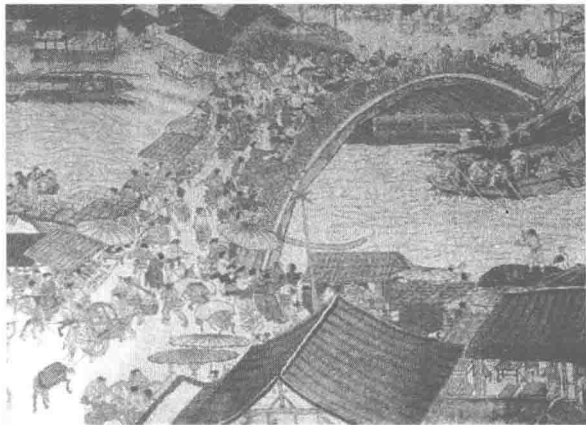


汉族地区，原已发展到封建制的后期，辽占领了汉族地区，用强力推行奴隶制——农奴制，这是一个逆转。金占领的地区比辽扩大了，山东、河南、陕西和安徽，江苏各一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这些地区原来在北宋时代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也都很发达，到金占领以后就大大衰退、逆转了。这是又一次较大的迂回曲折或逆转。

两宋发展的条件：

农民战争所起的作用是曲折的。黄巢在全国跑了一个大圈子，从山东、河北打到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又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打回到河南、陕西一带。朱温叛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五代十国的局面。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又恢复到前唐那样的发展轨道。黄巢为首的农民战争给封建势力的打击，对于宋朝都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自由商人和个体小生产者经济的发展，是起了推进和开路作用的。

宋朝经过了五代十国，又根据唐朝那样的政策，不但创造了小农（自耕农），而且创造了其他独立的小生产者经济。赵匡胤当时在开封北面的陈桥，通过他的弟弟和所谓十弟兄们举行了兵变，这些弟兄们对赵匡胤说，我们要你出来做皇帝，我们大家都拥护你。他说，你们要我做皇帝不是想要发财吗？你们要想发财就要听我的话。后来他就给了那些将军们大发财的机会，并给了士兵们一些钱财之类的东西，并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当兵了，回去种地、做小生意、搞手工业生产吧。在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争中，不少士兵腰包原来也就有了几个钱。这些人回到家乡以后，很多人都成了独立小生产者。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再一条，原来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唐朝以前，是黄河中下游。但南北朝时期华北乱得很厉害，西北也是这样。连年战争，除直接的摧残、破坏外，把西北的森林大都砍光了，水土保持不了，肥土让风刮走了，让水冲走了。山西太行山往西，粗略一看，是一片平原，仔细看，水冲出很多很大很深的沟，



在深沟里盖了房子，开辟园地。陕北也有不少这样的川沟和山沟。延安就有很多川沟和山沟是水冲出来的。在西北和华北遭受破坏和衰落的过程中，东南却逐步发展起来。东南在东吴还是水耕火耨，东吴时期有所发展。南北朝时，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并带去了全国最先进地区的经验和技術，更促进了东南的发展。所以到唐时，东南便取代华北而成了全国经济最发展的地区。经过了五代十国，北方很混乱，生产不发展，这时南方的经济，特别是江南的经济慢慢发展起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那些小国家的经济这时都有了发展。同时，在辽、金时期，北方的汉人不断向南移，把北方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的发展，这给两宋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在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农业生产和都市行会商业、手工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北宋和南宋的社会形势，有两种较突出的矛盾：一种是民族矛盾，一种是阶级矛盾。两宋如何处理两种矛盾呢？它应当适当调整内部的阶级矛盾，才有力量解决宋辽、宋金间的民族矛盾。两宋的统治者没有这样做。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一些改良政策，也实行了一个时期，但是没有能够贯彻下去。两宋实行了一些传统的改良政策，这些政策对生产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是这已不能适应两宋社会形势和两种矛盾交织的情况。两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上是倒行逆施的。当时苏东坡说过，天下大患有二，内患在民，外患则在北胡和西戎。他这个见解是不错的，差不多模模糊糊地道出了当时社会的两种主要矛盾。但他又说，宋廷应该用全力去对待内部的阶级矛盾，他说不把“内患”搞掉，就没有办法对外，只有平定了“内患”才能对外。因此他主张用全副精力对付人民。他这个主张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我对苏东坡的评价是六个字：“有见解，太保守”。当时大地主统治集团，不愿意放弃一点大地主阶层的利益来适当调整一下内部阶级关系，使强大的经济力量，不仅不能在政治和军事上发挥作用，反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抵消了自身的力量，而又束缚了生产的发展。假如当时对这两种矛盾处理得好，两宋生产发展速度还要快，规模还要大。由于两宋大地主集团的倒行逆施，两宋所辖地区不断缩小，并且造成了北方生产的衰落，助长了辽、金所辖地区的扩大，使南方、北方社会生产发展的差距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扩大了。

两宋经济发展的性质和唐朝不同，它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当时发



展的情况是：都市行会手工业的发展和独立生产者的经济比重一天一天地扩大；自由商人也在两宋时代发展了（以前是个别的）。所以在两宋有几大发明，而且不断改进。如印刷术、火药及罗盘针等等，都是这时期新的发明或有很大改进。如果两宋朝廷政策对头，使北宋的经济文化不断地发展下去，中国可能很早就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减少后来经历过的许多波折，中国历史也可能不致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期出现。我们今日，却只能按历史的实际过程来进行研究。

明朝（前明）的情况

朱元璋取得胜利以后，社会生产发展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高涨或波澜，到英宗以前仍有发展。

促使明朝生产发展的第一个原因还是农民战争、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元朝一开始建立统治以后，在内地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反元斗争就不断地进行。后来由于元朝对内地的统治加强了，内地的斗争转入地下，很多人转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到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处，所以边沿地区的少数民族反元武装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反元斗争加深了各民族的关系，加深了各民族人民的联系，对加强全国的统一起了重大作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过程中，改变了某些地方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比如原来的辽、金在北方实行落后的生产方式，元朝在长江以北实行落后的生产方式，农



元朝版图

民战争和民族战争迫使它们放弃奴隶制，促使它们向后期封建制的生产方式转化。由于这样的斗争，到了明朝，全国范围都恢复到了两宋社会发展的轨道上，并且使全国的统一发展了，统一的基础更加巩固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原来有契丹人、女真人，等等，到了明朝，契丹人和女真人都同化或融合在汉人里面了（顾炎武就说过，当时的华北汉族里面如山东人，不少是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的后裔）。南方的汉族中，吸收苗族、彝族、藏族等兄弟民族的成分也不少。这样



一来，民族的内容丰富了，人口扩大了，矛盾逐步得到缓和并接近于彼此融合了。元朝政府当时曾下过几次命令，要蒙古人回北方，回蒙古地方去，他们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当地已经扎根，比如姑娘嫁给了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民，他们的儿子娶了汉人的姑娘或其他民族的姑娘做媳妇，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已在当地生了根，等等，所以不愿回去了。比如郭沫若同志写的《孔雀胆》，就是元宗室梁王以阿湍公主嫁给了白族段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这种现象多得很。

同时，由于农民大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是很严重的。明朝的朱元璋本来是农民出身，是皇觉寺的和尚（劳动僧）。朱元璋做皇帝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政策，最突出的一点是把很多土地给了没有地或少地的农民；水利工作也做得不少；并且给了农民一些耕牛、农具；解放了元朝使用的大量奴隶，而且禁止买卖奴隶、禁止使用奴隶；同时他还实行了一些带有重商主义因素的政策，等等。

朱元璋统一了全国，除了蒙古贵族残余集团和一些部队，回到蒙古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继续与明廷斗争以外，明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都逐步巩固了。正因为明朝力量比较大，全国统一比较巩固，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父子，连同蒙古族在内，对所有少数民族也实行了“一视同仁”的政策（在中国的中世纪史上只有这次和唐朝的李世民实行了“一视同仁”的民族政策）。元朝和中亚细亚、南洋以至东欧的往来都是很密切的，明朝还是保持了这种往来关系，但是往来商品的性质和内容变化了，这和元朝不同，因为元朝和它们往来主要是通过蒙古贵族和色目人，他们的商品大多数是奴隶制或农奴制性质的掠夺或生产。明朝恢复了两宋以来那样性质的生产，而且其中独立小商品生产占的比重不少，因此明朝比宋朝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印刷术，今天我们看的书籍，明版印刷比宋版印刷好而多。

农业也发展了，农业人口急剧增加，耕地急剧扩大，技术也大大提高了；手工业生产比宋朝大大前进了一步，而且有新的成分出现，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到了明朝中叶，这已不是偶然现象，可以称得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正因为有这样的发 展，就出现了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郑和本来姓马，不姓郑，是云南回族人）。他走遍了西洋，到了东南亚，到了非洲。当时明朝与各国的往来，订立了一种文据，叫作“勘合”，发给与中国有往来



的各个国家，根据它，各国可以按规定多久来一次，每次来多少人、多少船只和中国做生意，也包括大量的进贡和赏赐。这在当时，受到交往各国的欢迎，只是常要求多给“勘合”。

由于这些原因，在前明，出现了我国中世纪史上的又一次生产发展的高涨或波澜。

上面讲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发展上几次高涨或较大的波澜。这几次高涨或波澜加速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一面。但是，既然有这一面，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那样长？为什么当外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却还没有？从 1840 年到全国解放前中国还吃了 109 年的苦头呢！下面就谈这个问题。

二、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几个较大的迂回曲折，或者叫逆转

欧洲在封建社会初期、封建农奴制结束以后，到后期封建社会，大概只经过 200 年左右的时间就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我国从秦汉到鸦片战争经过了 2000 多年。鸦片战争以后到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又由于列强的侵略，而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渡期。上面讲过，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发展有那么几次大的高涨或波澜，那么，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时间这么长呢？我不是全面地来谈这个问题，只想抽出几个问题来谈一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封建制度时代的后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也不是很晚才出现的。秦汉时代就有很多失去土地的劳动人民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且不光是为人佣耕的“雇农”。在战国时代，韩非子就讲到有人为人佣耕的“雇农”。中国从战国以后，特别从秦汉以后，就有出卖劳动力的人，到农村为人佣耕、到城市作酒保和从事手工业劳动等，不过不普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出现一点。正由于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有些历史工作者就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从唐朝就有了。还有些人说，中国近代史应该从明初开始。我认为：有点因素还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我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方面是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人口存在（社会上有这样的因素存在，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较普遍的现象，即能自由雇到这种劳动者）；另一方面资本家直接把资本投



人生产、购置设备、雇佣工人（这也不是只在某个地方偶然出现一家，不是孤立的，而是比较普遍，有促使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因素存在）。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经过这么长呢？

首先，我想概括地讲一下：以汉族统治阶级为主体的某些王朝的某些人，对国内其他各个兄弟民族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压迫，也包括军事镇压，对其他兄弟民族的社会发展，是起了阻碍作用的，甚至是造成了暂时的逆转，并每每影响到汉族地区的发展，但是不能够说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这样的。汉族统治阶级的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某些措施，某些政策，对兄弟民族社会的发展，也还起过促进的作用，至少在客观上起过这样的促进作用。其他兄弟民族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全国的发展也曾起过促退的作用，但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某些措施，某些政策上也起过促进作用。比如北魏孝文帝改制对历史的发展是起过促进作用的；又比如元对全国的统一、对密切欧亚的交通等方面，都是起过促进作用的；再如清，特别在康熙、乾隆年间对全国疆土的进一步确定和巩固，以及其他某些政策、某些方面，也都是起过促进作用的。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但是，我们说，以汉族统治阶级为主体的某些王朝的某些人，某些措施，虽然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起过促退的作用，但基本上没有造成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上的大逆转。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是由于汉族地区经济文化先进，汉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的往来一天天密切。不仅如此，而

且从封建社会早期汉族人民就不断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所以引起了今天中国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没有一个民族地区没有汉人，甚至有不少民族地区里汉族人口比少数民族人口还多，他们共同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这就更加强了少数民族同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断地得到发展，以至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都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因而没有引起大的逆转。



其次，我想谈一谈中国封建社会的几次大逆转。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华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我国中世纪历史进程中一个较大的曲折

在十六国各个集团的互相征战中，最初，某些少数民族人民是和汉族人民一起反对西晋统治阶级的，后来，就转变为各个民族统治阶级，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进行民族报复。所以当时的华北地区，不光是汉族人口，各个少数民族人口也是大量死亡，形成了“白骨蔽平原，千里少人烟”的悲惨状况。战火连绵不绝，把山上的树木全烧光了。特别是各个集团的小朝廷的政费和军费开支，除征收赋税外，还要进行军事掠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

北魏的南下（从今天的内蒙古西部和大同等地区南下），在当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北魏在南下过程中，征来征去，把十六国消灭了，统一了广大地区，使华北局面得到了相对的安定。但另一方面，北魏在南下的过程中，对生产力破坏很大。北魏原是奴隶制度，到了一个地方就俘虏人口做奴隶，掠夺牲口、财产，你如果抵抗，它就残酷地镇压。另外，北魏刚从原始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制，这是一个大进步，革命性的进步。南下时，同先进的汉族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这对北魏的奴隶制的发展有促进作用。这些是好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北魏南下以后，就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用强制的办法，在已经发展到封建制度后期的先进汉族地区推行奴隶制度，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当然，北魏没有完全把汉人的后期封建制度的生产摧毁，而是以它的奴隶制度，跟汉人的后期封建制度的生产并存、交叉地存在着，这样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政治上就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另外再谈）。这种反映在生产方式上的斗争，使得北魏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奴隶制度加快向封建制度转化，第一步转化到农奴制，但这还是比汉族原来的后期封建制生产落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过这样一段话：“……在长时间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的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



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语言。”^① 这种情况原则上适应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情况。但落后同化于先进是要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过程的，在未完成这种同化以前，它就构成了华北地区社会生产很大的逆转。并且这种生产方式斗争的矛盾反映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构成了北魏对华北地区的基本矛盾。这一条希望同志们学历史的时候要注意。我们有些历史学家就忽视了这一点，没有从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并存和其相互斗争出发，也没有从这个基础上去暴露民族矛盾。假若我们在这方面有所认识，就能揭露出这个时期历史的客观规律。我看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同志们还可以研究到底有没有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和斗争，到底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北魏、辽、金、元南进以后就由氏族制一下子飞跃到封建制，甚至一下子飞跃到后期封建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历史还有什么必然性呢？历史唯物主义又怎样解释呢？我看不能那么讲。当然，我这只是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鸣。

由于北魏时期的逆转，北方开始落后于南方。但是由于北魏各族人民进行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在生产方式的斗争中又反映了先进的克服落后的，初期的奴隶制、农奴制不断加快向后期封建制转化，因此才有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其意义有两条：加速了封建化，加速了汉化（他要鲜卑人说汉话，穿汉人的衣服，同汉人通婚，死了就按汉人葬礼埋葬在河南洛阳的北邙山上……不准搬回老家去）。孝文帝的改制起了进步作用。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到北魏末期，特别是到北周、北齐，奴隶制、农奴制的生产方式基本上不存在了，已经转化为后期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北方同南方的生产方式达到了一致，这就为南北的统一打下了基础。隋文帝就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南北统一起来。所以我们说，这时是社会的一个大逆转，但逆转的矛盾解决（转化过来）以后，又为隋、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叫做辩证法。但这是一个大逆转，假若不是这样，北方从秦、汉一直发展下去，速度快得多，不一定需要几百年，可以更早就出现像唐朝那样的局面。

五代、辽、金时期的大逆转

此时华北社会生产又出现了一次大的逆转。当时五代十国连年混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9页。



战，特别是在北方李克用父子同朱温打来打去，在河北、山西一带打得很残酷。同时，南方相互间的战争也阻碍了南方发展的速度、缩小了南方发展的规模。特别是契丹同女真军队的南进，契丹的耶律德光打到洛阳去，他派出军队去抢掠，叫“打草谷”，把洛阳附近几百里的地方都抢光、烧光，杀人、抓俘虏。女真军队南下的时候，把北方很多地方的汉人、契丹人的耳朵、手心穿起来，带回去作奴隶，或者出卖。把牲口杀吃了，房子给烧了。为什么这时汉人、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民那么反对辽、金呢？为什么牛皋等人能在太行山搞起来，晋南忠义社、八字军能搞起来？就是因为有这些矛盾，是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由于人民的斗争，使辽、金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一些，减轻了破坏的严重程度。这就是人民通过反金斗争保卫了自己一些利益的具体表现。



契丹骑马图

同时，我认为契丹人脱离了唐及其后的中央朝廷的统治而建立起的独立政权（耶律阿保机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女真人脱离了中央朝廷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政权，都是奴隶制政权（由完颜乌骨迺、完颜阿骨打完成了女真的奴隶制变革）。这就使辽、金自己从原来的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辽、金这种独立是革命性的行动，是进步的。（以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独立是有革命性的，那种分裂主义的“独立”才是倒退。）加之辽、金同汉族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使辽、金这些地区的生产发展得很快。苏联有的历史家说北方不能出现奴隶制度，我看我们的北方就出现了奴隶制度。

另一方面，辽、金在先进的汉族地区推行奴隶制。契丹人在山西、河北；女真人在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江苏、安徽、陕西的一部分



地区，使用暴力，不仅俘虏很多汉人、契丹人以及其他民族人民作奴隶，而且在当地占据了很多土地，原来作为牧场，后来以之进行奴隶制的农业生产。辽、金按照自己原来的组织形式把汉人组织起来，契丹的组织叫“头下军州”，女真的组织叫“猛安谋克”，这是从氏族制度发展起来的，原是氏族公社，后转化为农村公社，最后又变成农奴制的庄园。但汉族在这时已经发展到封建制末期，不仅都市的行会手工业、商业很发达，独立手工业生产也很发展。现在辽、金把这一部分地区压回到奴隶制、农奴制的生产基础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逆转。

这里希望同志们注意：在辽、金统治的地区，包括华北汉族地区，也就形成了几种生产方式的斗争，如奴隶制、农奴制、末期封建制、同时还有其他落后民族的原始公社制、主要是原来汉人的封建末期的生产方式和契丹贵族或女真贵族强力推行的奴隶制以及由奴隶制转化的农奴制相互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促进了在汉族杂居地区的契丹人、女真人较快地进步，这是好事情；但是另一方面，强力推行奴隶制、农奴制，压制了汉人原来已经发展到封建制末期这样高度的生产，却是大逆转。同时，辽（契丹）对北宋、金（女真）对北宋、南宋不断进行军事掠夺、破坏，以及大量俘虏杀伤人口等等，直接使宋朝地区生产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摧毁和破坏。同时宋朝每年向辽、金贡纳大量的金银财宝、绸缎绢帛，这就加重了宋区人民的负担，不能不影响宋区生产的发展。这就是辽、金在汉族地区造成的社会生产大逆转。但是，应该指出，这种逆转的造成，除上述原因之外，正如前面所述，与宋朝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宋高宗（赵构）、秦桧等大地主反动集团和汉奸卖国贼的倒行逆施有直接关系，他们对历史负有罪责！

因此我们说，经过隋、唐的发展特别是前唐的发展，南北朝时代南北生产发展的差距缩小了（当然，从唐朝起，南方发展得比北方快一些，所以唐朝国家的财政收入以及供应等的主要来源，已开始依靠长江流域，特别是东南），而这时又重新扩大了南北生产发展的差距（虽然战争也阻碍了南方社会生产的发展，但由于华北受到的摧毁和破坏那样严重，却使这种差距扩大了）。而在几种不同生产方式的斗争基础上的深刻复杂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又对那种正在不断扩大的差距起了缩小的作用。但是由于契丹人或女真人在自己原来的地区里以及在他们统治的汉人地区里所实行的奴隶制生产和农奴制生产，到辽、金灭亡的时



候，契丹或女真都还没有完成向末期封建制生产的转化（我们知道，契丹贵族占主要统治地位的辽，是被金、宋联军灭亡的，女真贵族占主要统治地位的金，是被蒙、宋联军灭亡的），因为他们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化，又延长了历史逆转的形势。

元朝特别是蒙古军南下和元朝初期，这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中又一次大的曲折或逆转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史学工作者的意见不是一致的，我还是根据个人的看法来讲。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也重复查了许多资料，和有些人的看法还是不一样。有些人说，关于蒙古族南下的资料不可靠，不论是国内的资料或者是国外的资料，都不可靠，如说有关蒙军西征的资料，都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写的。我想根据元朝自己的文献来讲。《元典章》和《元朝秘史》都是元朝自己的文献。还有《新元史》，是柯绍忞写的（我在青年时期开始学习历史的时候，对元史上好些人名、地名抓不稳，就去向他求教，拜访了三次，他才接见我。言谈中，表明他对元朝是非常赞成的）。另外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是李志常写的。李志常的老师丘处机自称为“长春真人”，是元朝的国师，他原是住在山东青岛崂山的大道士。晋东南永济县的永乐宫，就是在他死了以后，为了宣扬他的教旨和纪念他而盖的。这些材料不能说不可靠。他们主要是对元朝讲好话的。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概括起来这样几条：

第一，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以前，蒙古族是在金统治下的一个部分。成吉思汗把蒙古族从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且把各个部落统一起来，同时他使蒙古社会由原始公社制进入奴隶制。关于这方面的材



成吉思汗纪念像

这是世界最大的纪念雕像，位于乌兰巴托以东40公里处的土拉河畔，传说是成吉思汗发现金马鞍的地方。这座纪念像于2008年建成，高40米。纪念像面向南方，表面用250吨不锈钢包覆。纪念像下面的游客中心有36根柱子，象征从成吉思汗到林丹汗这36位大汗。